

底層的聲音與階級的浮現

——評《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

● 鄭慶杰

在《中國工人》中，作者關注轉型期中國現實社會，關注的對象是佔了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底層群體——工人。雖然這不是這個研究領域的第一本專著，但是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調查地點的典型性、研究視野的歷史性和研究意識的反思性。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對於生活在新世紀的許多人來說，「階級」已是一個很遙遠的概念了，它所代表的那套話語早就被遺忘在歷史角落裏，只留下了作為書寫符號的影子。直面現實，我們會發現「階級」這個詞的能指與所指的

分離。在現代化的滾滾車輪之下，階級是如昨日黃花，還是正在浮現？至少對於建嶸而言，這是他學術生命的關注所在。

一 直面田野與反思

《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以下簡稱《中國工人》，引用只註頁碼）是于建嶸近十年間研究計劃的一個延續。《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是他前期的研究成果，其中作者採用政治社會學和政治人類學的思路，以湖南衡山縣岳村為個案，對轉型期中國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進行了經驗考察和理論探究，飽含深情而又不乏思想力度^①。在《中國工人》這本書裏，作者同樣在熱烈和冷靜之間，以江西萍鄉安源煤礦為個案，繼續關注轉型期中國現實社會。這兩本書，前後共同構成了作者學術生涯的交響變奏。兩項研究關注的對象，分別是佔了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底層群體——農民和工人。

* 本文的撰寫得到上海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編號：SHUCX101096）的資助。

在當前社會轉型深化階段，隨着社會經濟各項改革的全面展開，各階層間貧富日漸分化，差距也愈來愈大。對於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個問題，目前學術界有「斷裂論」、「中產階層論」、「結構化的再生產」和「碎片化」四種論說^②。而當前中國的社會分層結構形態究竟是階級，還是階層，也是眾說紛紜。階級是原來歷史身份構成的延續，抑或是一個新的組合？在學界中，「回到馬克思」和「重返階級」的論題不斷湧現，但階級真的「重現」了嗎？還是只是學術場域一如既往的話語之爭？

無論理論模型多麼完美，要了解工人，學者還是需要去面對真正的現實，要從自己的親身觀察和與研究對象交往中，聆聽底層的聲音。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需要採用人類學的田野方法，到工人中去。于建嶸從2001年5月到2005年4月，斷續用了四年的時間，先後數次到安源煤礦進行了觀察式訪談。

《中國工人》總體分為三部分，前兩部分以歷史文獻、開放式和結構式訪談、口述史的形式，分析了社會變遷中的工人和工人行動中的政治，第三部分是作者的研究結論。雖然本書不是這個研究領域的第一本專著，但是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調查地點的典型性、研究視野的歷史性和研究意識的反思性。

選擇安源煤礦作為田野調查地點，是作者一以貫之的研究思路使然。《岳村政治》的個案研究，作者選擇了中國革命農民運動紅色鄉村的起點——岳村；對於中國工人的調查，作者所選擇的安源煤礦，同樣是中國革命工人運動的起點。在工業史上，安源曾是中國近代工業的

最大煤礦基地；在革命史上，1922年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和1927年秋收起義均發生於此。「安源珍藏瞭〔了〕解讀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和中國工人階級命運的密碼！」（頁78）「安源工人階級的產生、戰鬥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實際上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全部歷史和現狀的縮影。」（頁77）

《中國工人》的另一特點在於作者縱貫百年的歷史研究視野，這對於田野調查的個案研究尤為必要，只有把握了研究對象所嵌入的歷史之網，了解其生命流變，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其命運和意義之所在。作者基於礦志、地方史志、檔案、口述史等文獻和訪談資料，把研究對象放置於中國近現代社會百年變遷的歷史維度。他要考察隨着時代、政權、社會形態、政治話語的更換和交替，在百年的命運起伏裏，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發展和轉變；從洋務運動到安源工人大罷工，從革命到共和國的建立，從工人「老大哥」到1990年代以來至今的下崗分流、失業和再就業，這個階級經歷了怎樣的苦難和幸福、奴役和解放、曲折和勝利、希望和眼淚、力量和無助。對於每個家庭而言，代際的流動和工人地位的變遷、昔日的輝煌和當下的落魄、曾經的記憶和現實的嚴酷，年輕時的豪言壯語和退休後的暗淡無光，對於這一切，牢騷和不滿、突圍和掙扎、憤懣和冷靜、行動和觀望、訴求和沉默、期冀和無力，在每一個訪談對象身上湧現，得以傾訴。

對於研究中的「一階」理論還是「二階」理論、民族志文本是客觀現實的反映還是充滿了「寫文化」的困境，這是人類學和社會學調查研究中「多重解釋」的終極性問題。面對

作者對於訪談對象，有着明確的「主位」意識取向，研究聚焦於訪談對象的自我敘事，傾聽他們自己的聲音，但又不局限於「底層工人」的唯一性，而是給多元聲音的共現提供了表達空間。

在一個世紀以前中國近代工業發端時，工人就是社會的底層，外來的革命知識份子代表他們發出了奪政權、鬧革命的聲音。一個世紀以後的改革中，工人地位日漸邊緣化，重新成為社會底層，他們的聲音又在哪裏？

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在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係、研究者的立場與話語、研究者理解他者時的前見等方面，隨時保持自覺反思和多方印證是必要的。在《中國工人》的文本閱讀過程中，我們能夠感覺到作者的敏銳和自覺。作者對於訪談對象，有着明確的「主位」意識取向，研究聚焦於訪談對象的自我敘事，傾聽他們自己的聲音，但又不局限於「底層工人」的唯一性，而是給多元聲音的共現提供了表達空間。在訪談對象中，我們會發現幹部和工人，工人內部的正式工、合同工和協議工，在崗工人和退休老工，健康工人和傷殘工人等多種身份的存在。但是在書的末章，作者說他「總想把自己變成無關緊要的『客人』或『旅遊者』……由於長時期的交往，我還是不幸地成了被研究者的訴求對象」（頁451）。對作為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存在的「主體間性」而導致的研究信度問題，作者表露了自覺的反思意識。

二 記憶與現實交織的呼聲

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站在後殖民主義立場以其銳利的解構風格追問到：底層有自己的聲音嗎？底層能夠說話嗎^③？在《中國工人》中，于建嶸問到：在一個世紀以前中國近代工業發端時，工人就是社會的底層，那時他們有自己的聲音嗎？「中國工人階級在其形成過程之初就被一種外在的理論和需要所困惑」（頁457），工人「是被革命動員的對象」（頁384），而外來的革命知識份子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政治動員，代表他們發出了奪政權、

鬧革命的聲音。一個世紀以後的改革中，面對國有企業的轉制與破產、資方的控制與苛待、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工人地位日漸邊緣化，他們重新成為社會底層，他們的聲音又在哪裏？

百年間，面對國家和民族的宏大敘事，面對階級力量的塑造和強勢話語的代言，歷史洪流中社會底層小人物和沉默的大多數，對於自身的悲歡離合、顛沛流離、幸福和屈辱，他們又是如何記憶和敘說的？從人類學的凸顯主體、新社會史的微觀探究到話語權的轉移和回歸、歷史敘事的轉向和口述史的此起彼伏，各個領域的學者都在為底層社會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敘寫自己的歷史而努力。

在《中國工人》中，近百名訪談對象在安源煤礦的日常生活空間裏扮演了各類角色：退休的老工人、舉家失業的礦工、鄉鎮企業體制下的下崗工人、安源煤礦的決策者和白領工人、生產廠區的中層幹部、工會幹部、外來的農民工、工人階級隊伍裏面的各類等級位置上的身份（正式工、合同工、協議工、臨時工）、為退休工人爭取待遇的工人代表、工人中的知識份子、深受職業病折磨的工友等等。他們在安源煤礦這個生活世界裏勞作生息，娶妻生子，生老病死，有些甚至世代從事煤礦職業，因此安源煤礦對於他們生活的意義豐富而重大。世代流傳的父輩起義的故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和秋收起義廣場、早年革命領袖的足跡和傳說、古舊的萍鄉煤礦小洋樓、懸掛的領袖頭像和遍布各處的宣傳標語，這些空間的歷史遺迹、革命符號的象徵意義、家族和個體的生活史、工

人階級的身份建構和歷史地位的起伏交錯，散落在安源煤礦地域、社區空間的每個角落。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安源煤礦獨有的革命聖地地方性文化，並深深銘刻在安源工人群體的社會記憶中。

《中國工人》的前兩部分中大量的口述訪談資料，折射的是底層群體的曲折命運和內心期冀，這些口述史，揭開了主流話語關於工人階級的宏大敘事背後所遮蔽的工人生活世界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同時我們也看到，歷史，在記憶中顯現和生成為當下，這是時間的弔詭。工人作為行動主體對於明天的展望和行動的取向，基於對昨天的歷史之解讀。

歷史發展到今天，紅色革命的過去和工人階級曾經的地位，與在改革大潮的衝擊下落魄和悲涼的光景，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反差。在或明或暗的不滿和抗爭中，安源煤礦的工人從遙遠的歷史記憶庫中啟用了很多意識形態話語：先輩的罷工和井岡山革命的主力軍、工人當家作主、工人老大哥、文化大革命時期工人地位高等等（頁63、201、328）。儘管建國後全面計劃體制下對於工人階級的體制性庇護的輝煌時代已一去不返，但是相對於當下工人日漸淪為社會底層的現狀，工人內心深處的落差感更加反襯了往昔的美好，這同樣可以被他們啟用作為維護自己權益的話語武器。這些都在工人「以理維權」的抗爭行動中有所表現，這就是當前底層工人的聲音。他們用行動表達自己的呼聲，其中既有生存的逼迫，也有歷史的記憶傳承。

湯普森 (Edward P. Thompson) 從文化歷史主義的角度考察工人階級如何實現從「自在」階級到「自為」

階級的轉變。他認為：「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時，階級就產生了……階級覺悟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④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承續上述思路認為，革命時期工人階級的革命利益和鬥爭立場的一致性並不是上海罷工的唯一動力，在罷工過程中，除了共產黨先進份子的意識形態動員之外，還有地緣和幫派的力量、地方文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罷工的形成，而非作為先進生產力隊伍的工人階級已經形成後的行動結果^⑤。這從另一個方面對影響工人階級形成的多元因素進行了解釋。

在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前期，主要是由於革命知識份子的外部知識輸入、干預、學校培訓宣傳，工人們的階級意識才初步形成，並意識到不僅要有組織地爭取自己的利益，還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不僅為了自己，還要為了全天下受苦的人而革命。剝奪並不一定必然產生爭取利益、抗擊壓迫的集體行動，還需要通過意識形態的宣傳，改變人們的觀念，形成一致的階級意識和階級利益，才能夠形成階級行動。至此，工人階級被建構的歷史路徑得以顯現。

今天的安源工人，在身份方面，無論是崗位、合同還是工資待遇，都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內部深度分化的（頁56、128）。在抗爭行動中，因為兒女就業、自身身份、既得利益、地位差距、歷史遺緒等種種原因，對於改革中的利益得失，工人內部立場各異，進而導致

相對於當下工人日漸淪為社會底層的現狀，工人內心深處的落差感更加反襯了往昔的美好，這可以被他們啟用作為維護自己權益的話語武器。這些都在工人「以理維權」的抗爭行動中有所表現，這就是當前底層工人的聲音。

了維權行動的分化。面對工人內部的身份、地位分層等諸多差異，于建嶸產生了一些疑問：鑒於安源工人階級內部嚴重分化，目前工人階級還是一個整體性階級嗎？如果這個階級已經解體，那麼抗爭中形成的主體又是誰？

三 「迷失」後的「浮現」

于建嶸通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工人階級是「迷失的階級」（頁453）。早期，他們的階級意識是被知識份子和外部力量建構出來的。建國後，為了兌現革命的承諾，工人階級的身份和地位以制度化的方式被確立，並作為完善國家工業體系和經濟積累的先鋒隊伍，被納入全能國家的單位依附和計劃控制體系，從經濟上、政治上得到優於農民的保障。作為一個階級，他們未曾有過自覺的、有組織的共同利益鬥爭和行動。也就是說，無論在利益上，還是在行動上，「工人階級」都沒有實現從「自在」到「自為」，而是外力介入和制度安排的結果。「『工人階級』是一個政治化的意識形態概念。」（頁466）。

于建嶸認為，目前，工人階級在改革中已經處於劣勢的社會底層。他們的維權和抗爭的方式，已經超越了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所說的「生存倫理」階段^⑥，而是到了「以理維權」的階段，無論是起用過往的意識形態記憶話語，還是相似的生存境遇，都讓他們彼此站到了一起。不同於東南亞農民那種消極的鬥爭形式——「弱者的武器」^⑦，安源工人是進行有理有據的抗爭。此處的「以理維權」，是「政治倫理」

（頁466），而非「生存倫理」。因此，作者把工人的「以理維權」界定為一種「非階級行動」（頁465）。

然而，這一點是需要討論的，討論的前提是要把歷史上被建構的工人階級身份和現實中圍繞利益而行動的工人階級區別開來。一方面，歷史上的工人階級是被外部力量所建構的，從來沒有獲得自身的獨立性，因此成為了「迷失的階級」；而另一方面，雖然工人所援引的「理」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但是目前工人的「維權抗爭」行動，卻是在共同利益的一致、抗爭行動的自覺一致和組織化過程中形成的（頁437-42）。

進而，我們可以認為他們對傳統意識形態話語的援引，未嘗不是一種實現維權目標的理性策略選擇。因此，這依然是湯普森的主題：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歷自己的歷史中確定其含義的，是在歷史實踐行動中形成的。階級的形成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質變過程，而是一個因歷史條件積累而成的動態漸變之產物。雖然目前工人的「以理維權」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階級行動，但是不能否認它是階級行動的萌芽，其中蘊涵着階級意識的種子。一個階級在擺脫其被建構的虛假「階級」身份的同時，也正在通過維護自身權益、爭取社會地位的行動，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擁有自我意識和明確身份的「自為」階級。他們不僅僅要明白自己是誰、如何建構出現在的身份，他們還要通過行動決定自己會成為誰。在安源工人的抗爭之外，與2009年吉林「通鋼事件」類似的發生在各個地方的工人維權行動，都在說明這一點：階級正在浮現。

雖然目前工人的「以理維權」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階級行動，但是不能否認它蘊涵着階級意識的種子。一個階級在擺脫其被建構的虛假「階級」身份的同時，也正在通過維護自身權益、爭取社會地位的行動，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擁有自我意識和明確身份的「自為」階級。

于建嶸根據調查和其他案例得出結論認為，目前的工人維權在政治空間仍然有限的情況下，受到先輩革命記憶和話語的影響，多採用隱性和軟組織的形態，這會導致體制外的「秘密政治」行動（頁470），而這對於社會和工人自身權利的維護，都是一種潛在的危險。此論彰顯了作者作為一名學者的社會責任感和冷靜的責任倫理。此外，我們還可以問道：作者論證了歷史上革命知識份子的外力介入動員工人參加革命，進而建構了工人階級身份，工人階級在他人的動員和代言中迷失了自我，那麼，在工人群體維權行動此起彼伏的今天，包括作者在內的知識份子對於工人階級的研究，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又會對目前工人的行動和階級的浮現形成一種怎樣的影響呢？底層的聲音依然需要傳達和代言嗎？這其中所隱含的學術倫理，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反思的。

書末結論中，于建嶸認為：工人階級應該進一步劃定身份界限，才能形成階級認同，並且在政治上要賦予其利益組織化的政策許可空間（頁473）。此處或許留了些值得深入探討的理論空間：以甚麼樣的標準劃分工人階級：收入多少、管理技術等級還是資本所有權的控制？身份作為界限劃定而形成的階級認同如何處理與現代社會公民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因為利益維權組織化，已經是嵌入經濟組織中的政治問題。階級的形成包括哪些機制和過程？有了共同利益和行動是否是一個階級形成的標誌？只有階級利益、階級意識和階級認同，但限於政治過程和結構條件的不具備而未訴諸行動，那麼階級是否已經形成？

同時，正如作者在書中始終以農民作為參照系所關注的，要是工人作為明確的階級出現的話，類型化身份可能會與其他階級（比如農民階級）發生怎樣的聯合、協作與衝突？

中國工人階級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卻依然在迷失中。在新的世紀征程中，它能否找回自己的真實身份，確立自我，這只有等待歷史的回答。但我們仍然會問：底層是誰？聲音何在？階級正在浮現嗎？

註釋

① 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② 〈前言〉，載李春玲：《斷裂與碎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實證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8。

③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著，陳永國譯：〈底層人能說話嗎？〉，載陳永國、賴立里、郭英劍主編：《從解構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讀本》，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90。

④ 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前言〉，載湯普森著，錢乘旦等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冊（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1-2。

⑤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4-6。

⑥ 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程立顯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33。

⑦ 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弱者的武器》（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頁293。

在工人群體維權行動此起彼伏的今天，包括作者在內的知識份子對於工人階級的研究，會對目前工人的行動和階級的浮現形成一種怎樣的影響呢？底層的聲音依然需要傳達和代言嗎？這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反思的。

鄭慶杰 上海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
博士研究生